

江西省永丰县博物馆收藏了一通汉白玉碑刻，即《重建永丰县堂碑记》碑刻。该碑刻于2024年3月30日出土于永丰麻州生态岛引路修建工程工地，地点在恩江古城小西门内侧80余米处，即原明、清永丰县衙遗址附近。根据碑文记载，碑刻镌刻于“皇明戊子年”，具体年代不详。碑首弧形，正中横刻篆书“重建县堂碑记”六字，碑高181厘米，宽85厘米，厚21厘米。碑文楷书，竖行15行，满行40字，共计456字。

碑刻记载的历史事件

碑刻录文

重建永丰县堂碑记

丰阳，古岩邑也。襟带恩水，控引巖山。文章节义之邦，延袤三百里许。宣猷畅化悉于县治，系之《易》称大壮，《诗》咏《斯干》。具瞻重地，胥宇必先也。时戊子春，余来牧兹土，见堂构仅存故址，听政如菱甘棠，殊不雅观。乃稽之合邑父老，详述颠末，谓前此栋宇整齐，百榭拱峙，赫然神君政府，赤子春台也。近被兵燹，遂成乌有。奈地方凋敝，前历数令未获重创。余因有感，叹曰：嗟乎！县令奉命专城，岂可日宣无地？即今春燕巢林，秋鸿翔野，正宜建其有极，一劳永逸。亟动斯民以安堵之恩，因是夙兴夜寐，不憚拮据捐貲，召集耆老协从，先建此堂。序属中元，契龟卜吉。鸠工庀材，经之营之。匝月告竣。赞听膏署，次第修葺，库藏案牍帖然有归，更名其堂曰“明敕”。盖取前典，所称明罚敕法。噫！几几乎难言之矣。屠数万生灵之寄，而值偶失唐德，履畏民暴，并垂永世云。复从而铭之曰：仰昭昭对，俯柔靡雍。惟几惟康，寔寒匪朝。美丽重光，虔始始终。锦垂鼎彝，庆蕩花封。

皇明戊子采月既望，知永丰县事前南京西城兵马指挥、古汉阳尹宾莘撰记。主簿邹文旭。典史郭允光。县学司训龙世佐。

碑刻内容

《重建永丰县堂碑记》碑刻的发现揭示了一段重要的历史：皇明戊子年春，曾担任过明朝南京西城兵马指挥的尹宾莘，被委派到永丰县担任县令，到永丰后发现永丰县堂已被战火焚毁殆尽，仅存遗址，而由于地方经济凋敝，财政困难，前几届县衙都没能对其进行修复。尹宾莘召集原永丰县衙旧臣及部下僚属，捐筹资金、物资重建了永丰县堂，于同年七月竣工，取堂名为“明敕”堂，并自己撰写了《重建永丰县堂碑记》，勒石立碑以为警示和纪念。

碑刻的镌刻时间和历史背景

碑刻的镌刻时间

碑文中，作者尹宾莘自述是“皇明戊子年春”来到永丰任县令，于同年重建了永丰县堂，并撰记和勒石立碑。而明朝自公元1368年建立到1644年灭亡，共经历了4个“戊子”年，即永乐六年（1408）、成化四年（1468）、嘉靖七年（1528）和万历十六年（1588），那碑文中所述“戊子”年具体是指哪一年不得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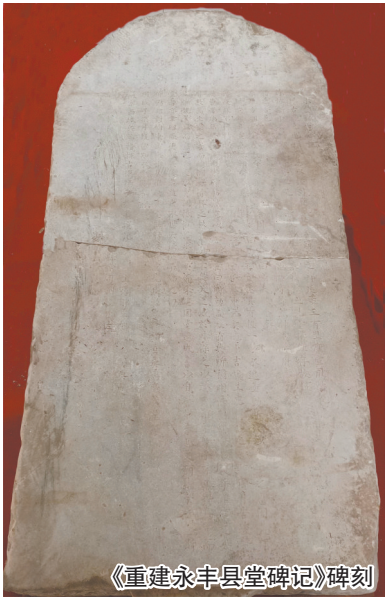
清同治十修《永丰县志》第七卷《建置志·公廨》记载：“嘉靖二年癸未知县商大节，万历四十七年己未知县翟式相前后增修，又毁于兵。崇禎年间，知县尹宾莘重建，自为记。”第十三卷《职官志·文秩官表》中把尹宾莘列入明朝崇禎年间秩官行列，列表中记载：“尹宾莘，汉阳人，兵马指挥，重修县署。”

根据县志的这两处记载，证明尹宾莘是在崇禎年间重建了永丰县堂。这个时间与碑文中所述的时间“皇明戊子年”两相印证，似乎可以确认，“皇明戊子年”就是指崇禎戊子年。如前所述，明朝只有永乐六年、成化四年、嘉靖七年和万历十六年是戊子年，崇禎年间（1628—1644）并没有戊子年。离崇禎年间最近的清初顺治五年（1648）为戊子年。那么尹宾莘在碑记中所说的戊子年到底是指哪个呢？永乐、成化、嘉靖基本不可能，时间上离崇禎年相差一百年以上。那是明万历还是清顺治戊子年呢？笔者认为清顺治戊子年，即公元1648年。依据有三：其一，根据史料记载，万历戊子年永丰没有重大战事，并没有碑刻中所说的重建县堂的历史记载。其二，如果是万历戊子年，尹宾莘肯定会明明白白地署上“万历戊子春”，如果只署“戊子春”或“皇明戊子”，这可是忤逆皇上的大罪。县志也不可能把尹的其人其事都记录为崇禎年间。其三，从县志的记载中可知，尹宾莘本人是明末崇禎皇帝的旧臣，碑刻落款中提到的主簿邹文旭、典史郭允光、县学司训龙世佐等都是明末崇禎年间永丰县前几届县衙的官员，至清顺治戊子年，即崇禎去世后的1648年，他们还在江西永丰县为恢复明朝统治而做着最后的坚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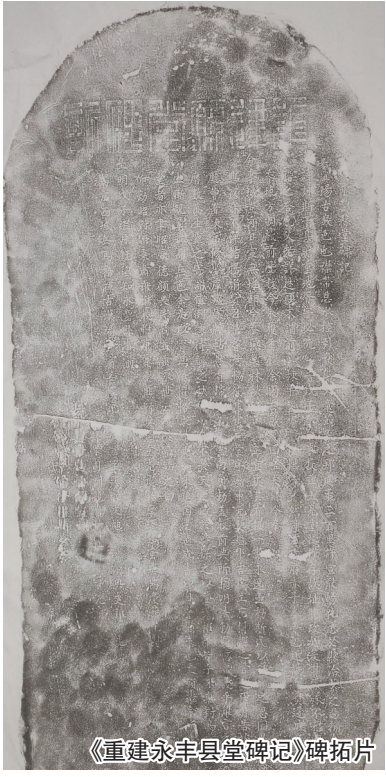
碑刻反映的历史背景

既然碑文中说的“皇明戊子”年就是清顺治戊子年，即明朝于1644年灭亡后的第五年（1648）。那尹宾莘是谁的委派来永丰当县令的呢？他代表的是明朝政府还是清朝政府？尹宾莘在碑刻中为什么要署“皇明戊子年”，而不直接写“清顺治戊子年”？这里隐藏着怎样的一段历史背景呢？

通过对碑刻的研究，揭开了明末清初江西、包



《重建永丰县堂碑记》碑刻



《重建永丰县堂碑记》碑拓片

《重建永丰县堂碑记》碑刻考释

苏卫军

括永丰一段被淹没的特殊历史，以上疑问也被一一解开。

自明朝崇禎皇帝1644年自缢身亡，清军人关建立清王朝后，明朝宗亲为了反清复明，先后在南方建立了几个流亡政权，合称为南明政权（1644—1662），共四位皇帝，一是在南京称帝的安宗弘光帝（福王朱由崧、1644—1645）；二是在福建称帝的绍宗隆武帝（唐王朱聿键、1645—1646）；三是在广州称帝的文宗绍武帝（唐王朱聿膺、1646—1647）；四是在广东称帝，后流亡到广西的昭宗永历帝（桂王朱由榔、1646—1661）。可见，清军1644年入关后，并没有马上占领全国，江南一些地方还在大明流亡政府的统治下，反清复明运动还在一段时间一定区域内开展。清军攻占江西。清军人关后，兵分东、西、中三路大军发动了统一全国的战争。其中东路清军进攻江苏和浙江，在击败弘光手下抗清将领左良玉之后，攻陷南京，弘光政权灭亡，后左良玉之子左梦庚部明军官兵家属近十万人在安徽东至县向清军投降，英亲王阿济格命令左良玉部将全部到北京朝见顺治皇帝，左部总兵金声桓害怕失去兵权，于是向阿济格自告奋勇，带领军队进攻江西，到1645年的八月末，江西十三个府除了赣州、南安等地在明军的控制之下，其余城市全部被清军攻陷。

到1646年，忠于隆武帝政权的南明军队以赣州为中心，向江西发动了局部反攻，先后攻克泰和县、万安县、峡江县、永丰县以及吉安府城。1646年初，清朝平南大将军勒克德浑在湖广大败忠贞营以及明督师何腾蛟部，向江西气势汹汹地杀来。在三月一举攻陷吉安，直逼赣州。十月赣州失守，南明隆武帝政权势力彻底退出江西。

清军平定明降将金声桓、李成栋反叛，重新控制江西。清顺治五年（1648）初，明降将金声桓巡防江西，与副将王德仁杀清江西巡抚董学成，迎明大学士姜曰广据江西叛清，举起了反清复明的义旗，很快控制了除赣州以外的江西全境。清帝福临以都统谭泰为镇南大将军，率兵20万进行征讨。三月，清军在九江击败明军7万人的阻击，缴获船只渡江，连下南康（今江西星子）、饶州（今江西鄱阳），进军南昌。金声桓、王德仁正率部围攻赣州，回师救援途中被清军谭泰部击败，退入南昌。翌年（1649）正月，南昌西门守军投降，引清军入城，姜曰广殉难，金声桓中箭负伤，投水自尽，王德仁被俘杀，清军相继攻占抚州、建昌（今江西南城）等地，恢复了对江西的控制。

尹宾莘被派到永丰任知县的时间，正是金声桓起兵反清复明，占领并控制江西的那段时间，即1648年初至1649年三月，这期间，南京弘光帝、福建隆武帝、广州绍武帝都被清军灭亡了，只有广西的永历政权（1646—1661）还在。所以尹宾莘应是受永历政权的委派来永丰任县令的，他代表的是明朝流亡政府，所以在撰写碑记时，肯定不会署清朝顺治皇帝的年号。此时崇禎已死，也不能用崇禎皇帝的年号。当然他也不一定用在广西的永历帝的年号，因为它存在时间短、统治的范围小，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所以只以“皇明戊子年”纪年，没有使用任何皇帝年号。

碑刻的考古和历史文化价值

考古价值

一是碑刻作为一种史料形式，记录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状况，为研究明末清初江西和永丰在那段特殊时期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和实物佐证。二是碑刻为研究永丰自治的建置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和实物佐证。永丰自北宋致和元年（1054）建县，当时县衙设置在延庆寺内办公，至南宋才开始建土城，明嘉靖三年开始建砖城，期间及之后县治及城墙多次遭遇洪水和战争的损毁，又经多次修复或重建。碑刻中记录的城池和县堂被战争摧毁，尹宾莘重建，就是其中的一次，故其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不言而喻，可谓弥足珍贵。三是碑刻的出土，为研究古代永丰自治、城池的建制和布局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和史料依据。根据碑刻的出土地点，可以基本确认明清时期永丰县衙的位置就在碑刻出土地点的附近，即县城小西门内侧80米处。

历史文化价值

一是历史价值。从碑文中可以看出尹宾莘及其幕僚大公无私、忧国忧民、恪尽职守的优良品格，这种品格在今天仍然具有穿越时空的时代价值。充分挖掘历史勤廉文化、厚植勤廉基因，借古鉴今，以文化人，是探索新时期勤廉文化建设的一条重要路径。二是书法价值。该碑刻碑首篆书，碑文楷书，共计456字，笔触清晰，笔画简练，结构严谨，笔法清新明快，有一定的书法研究价值。三是文物价值。该碑刻的出土和被永丰县博物馆收藏，是该馆碑刻藏品中唯一的一通汉白玉碑刻，为博物馆的收藏历史和文化遗产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可以说，《重建永丰县堂碑记》碑刻是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也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具有重要的考古和历史文化价值，为研究明末清初江西的历史，包括永丰县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资料。通过对这通碑刻的研究，可以揭示明末清初改朝换代时期江西的特殊历史背景，这对于了解江西，特别是永丰的那段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欧阳修《泃冈阡表》碑中的优秀传统文化

欧阳慧玲

在江西省永丰县沙溪镇欧阳修故里西阳宫内，至今还保存着一方千年古碑——《泃冈阡表》碑，该碑为墨绿色青州石，高2.12米、宽0.96米、厚0.24米，碑文千余字，楷书阴刻，这是一代文宗欧阳修为了祭悼父母而作的一篇著名碑志文，是我国古碑中极具盛名的一大名刻，也是欧阳修存世最大墨迹，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价值和深远的教化、启迪意义。1957年，江西省人民委员会将其确定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其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泃冈阡表》碑历史脉络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北宋吉州（今江西吉安）永丰人，24岁考中进士，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副宰相）等职。歿后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他是北宋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经学家、金石学家、目录学家和谱牒学家，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培养提携曾巩、王安石和“三苏”，成为“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六家之首。著有《欧阳文忠公集》《新唐书》《新五代史》等。

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欧阳修母亲郑氏夫人病逝。次年七月，欧阳修护送母丧回故里江西永丰沙溪与父亲合葬。居丧期间，他追忆父亲遗训、缅怀母亲教诲，作《先君墓表》。后因岳母金城夫人去世噩耗传来，他匆匆离开家乡北返。

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64岁的欧阳修正任山东青州知州。他取出了17年前在沙溪老家创作的《先君墓表》，反复琢磨，精心修正，又以沙溪老家“泃冈”地名为碑名，其曰《泃冈阡表》，择取一方墨绿色青州青石，亲自书写请人镌刻，派人运回沙溪，立在父母坟院里。这就是传颂古今、蜚声中外的《泃冈阡表》碑。

《泃冈阡表》碑文化价值

欧阳修的《泃冈阡表》，与唐代韩愈《祭十二郎文》、清代袁枚《祭妹文》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著名祭文。碑文讲述了父母生前为官、做人、处世的诸多事例，以教育、培养后代形成廉、孝、仁、爱的良好品德。《泃冈阡表》不仅是廉政文化、孝道文化的典范，还是仁政爱民、母教文化的标杆。

廉政文化的表率 欧阳修父亲生前为官清廉自守，乐善好施，喜欢接待穷人，热情好客，微薄的薪金从来没有结余，以致他去世之后家里穷得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境地。他还常说：“毋以是为我累”，意思是“不要让我钱财累我的声誉，影响我的清白”。欧父的一言一行，体现出他高尚的道德品质与坚定的为政理念。欧父不仅是中国古代守廉济困的榜样，也是我们当代党员干部勤廉品格的楷模。

孝道文化的典范 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强调子女对父母及长辈的尊敬、爱护和赡养。它源于儒家伦理思想，被视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核心之一。欧父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欧母说在她嫁到欧阳家时，她的婆婆已经去世，逢年过节祭祀先人的时候，她总看到欧父哭泣着说：“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意为对待父母长辈，与其祭祀时摆上丰盛的祭品，还不如在他们生前尽绵薄之力去孝敬好他们来得实在。这句话是文章的精髓，也是欧公所提倡的“厚养薄葬”孝道观的主旨。欧母还说，当家里偶尔摆上好酒好菜时，欧父会哭得更伤心：“昔常不足，而今有余，其何及也！”是啊，从前常嫌酒食不够，现在生活条件稍微好点了，想要好好孝敬父母却已经来不及了呀！

不论是“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还是“而今有余，其何及也”，都

名师高徒情深深

——欧阳修与苏轼的师生情谊

肖金华

在中国文学史上，师徒关系的文人学子很多，但真正能互理解、扶持、包容、砥砺、提携且能终生惦记爱护对方的师徒却很少，像欧阳修与苏东坡这对危难之中见真情的师生就更加少之又少了。欧、苏的师生情谊不仅在北宋，在整个中国文坛都有目共睹，传为佳话。

苏、欧的初次见面，是在北宋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当时正在推行诗文革新运动，反对西昆体、太学体，这种为了写文章而写文章，或者文章里充满了艰涩的典故和华丽的句子他很讨厌。他主张文道并重，也就是写文章要有感而发，他也很希望通过这一次科举考试，来选拔一批和他有相同见解的人才。他冒着很大的风险，把写太学体的学生拒之门外，于是放榜的时候，那些太学生就当街闹事，把欧阳修围了起来，在他的车前起哄，连巡街的士兵都无法阻止，然而即便如此，欧阳修顶着压力，也依然没有停止改革的步伐，在这次科考中，他惊奇地发现了一个未来的人才，就是眉山苏轼。

其实当时的考试制度，省考一共考了四场，按照之前的规则，如果第一场落榜就没有资格参加后面三场考试了，但欧阳修改革了这个考试制度，改成了四场综合成绩打分。虽然苏东坡第一场落榜，但是真正让他名声大作的还是他的第二场考试，他写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后来收入《古文观止》。四场综合成绩下来，苏东坡顺利登科，成功进入了殿试。那一年包括苏东坡在内的388位人才，成就了当年的进士，而当年的主考官也就自然成为他们的恩师。

按照惯例，苏东坡终于见到了向往已久的偶像，他回忆说，七八岁读书时，有一次先生带了一本《庆历圣德诗》，对小东坡说，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这四个人你要记住，他们是人中豪杰。后来苏东坡在给范仲淹的文集写序时描述了这件事。他说第一次看到欧阳公，欧阳公还介绍了二位大佬韩琦和富弼给他认识。他们“皆以国士待轼”，就是用天下读书人的最高礼节来对待自己。苏东坡还记得他第一次跟欧阳修见面的一些细节，他在《祭欧阳文忠公及夫人文》写道，先生开心地拍手鼓掌，他说你和我是一样的人，其他人不一定算得上我们的同行者，我老了要退休了，未来我希望能把文章之道传授给你。这是一个当朝的文坛大家对下一个希望之星的深深托付。欧阳修的识人之明和气度胸怀不言而喻。他评价苏



西阳宫门坊



《泃冈阡表》碑

是欧父一片孝养之心的真情流露，也是一种朴实而平凡的家风教养，更是孔子“子欲养而亲不待”及时行孝理念的弘扬和发展。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一个人感恩之心、责任心的体现。通常情况下，一个如果连父母都不懂得关爱和尊重的人，那他对国家和社会的忠诚度也会受到质疑。近些年，有些省市已有明文规定：“拟提拔的干部必须是孝敬父母的人，无德无孝者一律不予考虑。”

仁政爱民的标杆 欧父为官时，晚上常在烛光下审阅案卷，欧母看他总是停下来叹息。问他原因，他说：“这是一个判罪案的案子，我想救活他，可实在做不到啊！”欧母疑惑地问道：“死刑犯还能寻得活路吗？”欧父回答：“想办法为其求生而不得，犯人与我都不会留下遗憾，但倘若没有办法救活他，而我作为办案官更没有尽力去帮助他，那么死者与我都会留有很大遗憾了。”从欧父努力为死刑犯寻求活路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到他对百姓的悲悯仁爱之心、对生命的尊重敬畏之心以及对工作一丝不苟的责任感。这些事例对年幼的欧阳修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他成人成才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道德教育。

欧父还曾说过：“养不必丰，要于孝；利虽不得博于物，要其心之厚于仁。”意思是在家奉养父母不一定非要丰厚，最重要的是有孝顺之心；在外做官，利益虽然不能遍施于每一个人，但一定要常怀仁爱心之，为百姓多办实事、多做好事。

欧阳修就是在父亲清政、仁政、爱民思想的熏陶下，以父亲为榜样，后来也成为一位仁民爱物的好官。

母教文化的楷模 欧父去世后，年仅29岁的欧母，在上无片瓦，下无寸地的艰苦环境中，自誓守节，画荻教子，抚养、教育一双儿女长大成人。我们常说，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在那个时代，一位年轻的母亲能够在困厄中挺身而出，以柔弱之躯撑起这个家，可见欧母的坚韧与伟大。

欧母持家节俭朴实，哪怕后来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也不改变这种简朴的家风，她曾说：“吾儿不能苟合于世，俭薄所以居患难也。”意思是：我儿子一向坚持原则，不能苟且迎合世人，假若有一天遭受打击，再过苦难日子，那么很快就适应了。我们可以看到欧母勤俭节约的生活态度以及居安思危的处世方法。

1036年，欧阳修被贬夷陵，最让他放心不下的，是年过花甲的母亲要跟着自己过颠沛流离的苦日子。谁知欧母听到儿子贬官的消息，言笑自如地对儿子说：“汝家故贫贱也，吾处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意思是：你欧阳家本来就贫穷，我早已习惯过这种苦日子了，放心吧，只要你肯安心，我就安逸了。欧母乐观的心态和豁达的胸襟，给了欧阳修莫大的安慰和鼓励。

欧阳家的家风通过父母的言传身教，对欧阳修产生了极其深远影响，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他高尚的品格、卓越的学识和坚毅的士人风骨，使他成为北宋全才式的文坛领袖、政坛名臣、史学巨擘。欧母也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贤母之一，为后世所敬仰。

《泃冈阡表》碑启迪意义

《泃冈阡表》碑，是中华文化宝库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中华历史文化长河中的一座里程碑，它以不忘初心为主线，以纪念先人、教育后代为目的，以孝道文化、廉政文化、家风家教为内涵，树立了中华文化廉、孝、仁、爱之典范。我们应充分挖掘县域历史遗存和传统文化，并加以保护、利用与传承，使之在新时代展现出更为丰富的人文内涵与当代价值，古为今用，跨越千年，蔚藏盛放。

东坡，“读书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这也是成语“出人头地”的由来。

看见比自己更优秀的人，他不仅不嫉妒，而且还要为他让路，的确难能可贵，他在给自己孩子的书信中还说，三十年后，没人记得你老苏，但是他们都会记得苏轼。三苏年谱里记载了欧阳修喜得苏轼后，就以培植他成长为己任，一开始别人还一片哗然，很不服气。后来看见苏东坡的文采很一般，大家就信服了。当时的文风也因此得到改变，苏东坡的文章风靡一时。后来欧阳修又推荐他去参加制科考试，这个考试是特别难的，必须有人引荐，才有资格参考，欧阳修在推荐信里郑重说道，如果这个人我推荐错了，我甘心接受朝廷法律的惩罚。结果苏东坡的成绩前无古人，成为北宋开国三百年来“第一人”，一颗文坛的冉冉之星升起了。后来因与王安石变法派意见不合，苏东坡主动请求外放，到杭州任职。他先去看望了弟弟苏辙，然后与弟弟一起来到颍州拜访退休的恩师欧阳修。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苏东坡回忆说：“恩师告诉我，你能来我好开心，我所说的‘文章’，必然要承载道义，

否则就不是好文章，你要把持住自己。如果自己因为贪图名利而改变了志向，那么你就不是我的学生。”苏东坡叩头持谢，说老师您的话我记住了，我死都不会改变。很多年后，苏东坡写给欧阳修夫妇的祭文里说到这件事。他还说，虽然老师已经过世了，但是他的话像太阳一样照耀着我。

欧阳修去世以后很多人给他写过祭文，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来对比，比如说王安石写的和苏东坡写的，那种情感的浓烈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王安石是临风感怀，感慨再无人追随。而苏东坡就是“上为天下苍生而悲，下为我对先生的情感而痛哭”。

我们知道欧阳修有一个名叫“六一居士”，苏东坡曾经在《六一居士传》后写了读后感，如果我们有机会重读苏东坡的代表作《赤壁赋》，就能够从那首赋当中读出欧阳修的影子。欧阳修去世后17年，苏东坡第二次外放杭州，他专门去找了当年欧阳修推荐他的名僧惠勤和尚。可惜老和尚已经过世了，老和尚的弟子告诉他说，他们把欧阳修和惠勤的画像挂在厅堂中，然后每日祭拜，一个月后，居然出现了一眼清泉，苏东坡也非常感慨，于是把这口泉命名为“六一泉”，时隔千年，现在这口泉还在，位于杭州西湖，孤山南麓西泠印社的西面。

对中华文化而言，我们有幸得遇苏东坡，而对苏东坡个人而言，他有幸得遇欧阳修。人生中能遇见一个能懂你的人太不容易了。而且更可贵的是他不仅懂你，还愿意不遗余力地帮助你、提携你。有这样一位师父或者说你生命当中有这样一句“师父”可以叫，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欧阳修与苏东坡正是如此。